

五代十国墓志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杨 超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目前, 学界有关五代十国墓志的探讨, 在志文汇集、初步考索、综合研究方面, 已有不少论著问世, 尤其在墓志汇编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今后一个时期, 应加强对墓志史实的基础性考辨, 推进墓志中五代社会的“共识”研究, 积极建设墓志智能数据平台, 以推动唐末五代宋初历史相关研究。

关键词

五代十国, 墓志, 研究述评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Epitaph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Chao 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September 15,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At present, 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epitaph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has produc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orks in terms of the compilation of epitaph texts, preliminary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studies, with important achievements made especially in the compilation of epitaph collec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s. In the coming period, effor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basic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recorded in epitaphs, the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on the “consensus” of the Five Dynasties society as reflected in epitaphs, and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lligent data platform for epitaphs, so as to promot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Keywords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pitaph, Research Re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五代十国时期纷乱短暂，学术衰微，传世史料稀少。但因其在唐宋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愈为学界所重。五代十国墓志为该时期研究补充了新材料。目前，学术界在志文汇集、初步考索、综合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论著问世，尤其在墓志汇编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然而，五代史事纷杂，人物的生平事迹、制度的承袭更替、思想的传承变迁，均不易理清，自五代而北宋，由分而合、由乱而治的历史细节仍有待梳理。现不揣浅陋，就当前研究状况略作总结，对近期需着力之处提出一二建议，敬请方家指正。

2. 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五代十国墓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墓志目录的编纂、志文的汇集和数据库的建设。高桥继男、竹内洋介的《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墓志综合目录(增订稿)》(2017)，收录了墓志类石刻 530 通，是当前著录五代墓志数量最多的目录[1]。谭凯(Nicolas Tackett)编集的《唐末至宋初墓志目录》(2005)收录五代墓志 242 通，末附录文[2]。周阿根的《五代墓志汇考》(2012)，收录墓志 242 通，主要是录文[3]。章红梅的《五代石刻校注》(2017)，收录五代石刻材料 350 通，校注以文字校勘、词语典故解释为主，涉及少量职官和史事[4]。仇鹿鸣、夏婧辑校的《五代十国墓志汇编》(2022)，收录墓志类石刻 452 通，另有相关宋代墓志 42 通，其书是目前全文收录五代墓志数量最多的专门著作，内容主要是录文，书后编有较详细的墓志所涉人名索引[5]。该书与高桥继男等所编目录著录数量上的差异，主要由于所收标准不同，如仇、夏书不收志盖、玉册等。此外，有些稀见墓志如《令狐珙墓志》等，或未见及，故仇、夏书付之阙如。杜文玉主编的《全五代十国文》(2023)，收录五代墓志类文献 428 篇，另存辽、朝鲜半岛 23 篇，其特点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兼收，但出土墓志著录数量不及仇、夏书，传世文献中墓志仍有遗漏[6]。著录五代墓志较为重要的数据库有两个：一是浙江大学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目前收录 354 方，拓片、录文兼收。二是中华书局“历代石刻总目数据库·唐五代墓志专目”(近来正与“唐代墓志铭”库整合)，目前收录 388 方，另有相关宋代墓志 35 方，具体年代不详 115 方。两大数据库均设有丰富的索引功能。

第二，单篇墓志的考证。主要侧重文字释读和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的考索。相关研究包括杜建录等的《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2015) [7]、钱汝平的《唐末五代危全讽、危仔昌兄弟家世补证——新见〈宋故危先生墓志铭〉考释》(2019) [8]、程浩的《广州出土五代南汉李纾墓志初考》(2021) [9]、刘缙、史林鹰的《五代北宋时期苏逢吉家族墓志再考》(2022) [10]、陈桂苹、刘广丰的《新出五代〈张进墓志铭〉疏证》(2023) [11]、赵耀文的《碑铭与史传：五代武将西方邨的生前事与身后名》(2024) [12]及黑维强等的《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绥州任从真墓志〉的研究价值》(2025) [13]等等。

第三，从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社会史等角度对墓志进行研究。例如，崔世平的《新出后晋张奉林墓志与后唐政治》(2014) [14]、山根直生的《五代洛陽の張全義 - 『沙陀系王朝』論への応答として - 》

(2016) [15]、胡耀飞的《五代的“通判”与“判”——从福州出土〈赵偁墓志〉谈起》(2017) [16]、胡倩的《五代墓志文研究》(2018) [17]、仇鹿鸣的《“伪梁”与“后唐”：五代的正统之争》(2021) [18]、山口智哉、柳立言等编著的“五代在碑志”系列论著《五代武人之文》(2021) [19]、《世变下的五代女性》(2021) [20]、《五代的文武僧庶》(2022) [21]及刘顺、仲昭龙的《五代墓志文的帝王形象塑造与君臣互动书写》(2026) [22]等等。其中，胡倩的博士论文在探寻五代墓志文体特点时，指出“模式化”、“谀墓现象”严重，为准确认识五代墓志提供了重要参考。仇鹿鸣从墓志中对后梁和后唐前后称谓的变化，审视中原王朝一系的正统之争，视角独特。山口智哉、柳立言等系列论著，通过墓志关注社会变迁、阶层变动、文武关系等问题，揭示五代社会风貌，是近年来五代墓志研究中较有特色的新成果。由于墓志材料的特殊性，语言文字研究也受到较多关注，如欧昌俊、李海霞的《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2004) [23]、李海燕的《隋唐五代石刻文字》(2011) [24]、周阿根的《五代墓志词汇研究》(2015) [25]及黄青青的《〈五代十国墓志汇编〉释文斟补举隅》(2026) [26]等在五代墓志文字释读方面有一定贡献。

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五代墓志本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材料的搜集和初步整理层面，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无论是新作还是数据库均有遗漏，个别墓志录文仍存在问题，且限于体例，在著录上，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尚未能很好地兼顾。通过墓志对五代历史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新趋势，相关成果逐年递增，但仍有较大深入挖掘空间。

3. 研究展望

墓志作为丧葬用品的特殊用途，使其史料内涵具有独特性。墓志所述事迹未必可靠，但其标明的年代、职官、地理、器物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展示的礼仪制度、文化心理、思想状况往往较为真实，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当前，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五代十国墓志的相关研究工作。

3.1. 加强对史实的基础性考辨

如上所述，五代十国墓志虽然在文本整理层面已有可喜成果，出版了几种汇编类著作，但均侧重文字校勘和词语解释层面，学界若对墓志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建立在对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全面准确深入揭示的基础之上。因此，以墓志的逐篇注释与考证为核心内容的工作亟待开展。

试举一例。五代后梁名将谢彦章，其名字在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中均作“彦章”。依据《谢彦璋墓志》[27]，结合《太平广记》[28]所引，作“彦璋”为是。又《旧五代史·谢彦章传》记其因与贺瓌、朱圭有隙被二人诬陷谋反并杀于阵前[29]，而据墓志所云，其父母、夫人、长幼四子均一起祔葬，知乃是满门抄斩，再结合墓志所记其职官、经历及《资治通鉴》彦璋被杀前贺瓌“密潜之于帝”[30]的记载分析，谢彦璋之死主要因其功高权重为后梁末帝猜忌所致，贺、朱二人不过为皇帝背锅而已。五代更迭均由武人夺权，在位帝王为规避风险，不惜自断手足，制度的缺陷不仅制造了政权的混乱，也造成了众多武将的悲剧人生，而墓志往往能为我们揭示传世文献隐晦不彰的内容。当然，这需要细致的考辨。

五代墓志考释涉及人物、地理、职官、事件、风俗等多个层面，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和文化心理亦值得关注。研究重点可先集中于重要事件、职官制度、地理沿革三个方面。当然，也存在一定难度。首先，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相当一部分志主在历史上默默无闻，记载较少，甚至根本不见记载，故辨析墓志所述的生平事迹十分困难。其次，晚唐五代职官制度紊乱，地理变迁复杂，传世文献所载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分散四处，墓志又仅记名称而无沿革，如何厘清其中曲折，甚为棘手。再次，怎样将志主及墓志所涉人物、事件、制度置于五代大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亦颇费识力。有鉴于此，研究者既要查考唐末五代、宋元人所撰相关文献，又要注意宋元石刻、出土文献以及明清两代的有关著作，并充分吸收当代学者的单篇墓志考证成果，力求网罗全面，考证准确，解读确切。

为此，不妨按以下思路来具体操作：

第一，全面汇集目前所见五代十国墓志，包括出土和传世两部分，剔除重复，补充遗漏，续收新见。其中，尤其注意搜辑隐藏于宋以来石刻著作、方志、文集、家谱等传世文献中的墓志，并对各地文博部门尚未公布的相关墓志尽力搜求。

第二，参考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文字校勘和精确释读。现有汇编著作录文，因所据拓片或原石不清晰的缘故，个别文字未能释读或释读有误，应据较清楚拓片予以纠正。传世文献中的墓志，涉及不同版本，多有文字错讹、改动，应据善本校勘。

第三，逐篇注释墓志涉及的人物、地理、职官、事件等内容。其中，人物重点关注生卒年月、婚姻状况、家族情况、仕宦经历、个人著述。地理、职官重点梳理其在晚唐五代宋初的复杂变动。史书有载的事件，侧重互补互证；史书失载的重要事件，侧重注出相关历史背景。

第四，对重要篇目所涉人物的生平经历、制度的沿革变迁、事件的来龙去脉、风俗思想的承袭演变等，进行较详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考证”形式附于相关篇目之后。

通过对墓志的详细考证，梳理出志主的人生轨迹，理清墓志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将这些个案集中呈现出来，必会有助于学界发掘五代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相关重要问题，大幅推动晚唐五代宋初历史的深入研究。

3.2. 推进五代社会“共识”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林立，士族播迁，民不聊生。但割据混乱的背后，仍然存在诸如恒定的文化认同、对传统理想个体的集体追慕、崇文的社会思潮、天下一统的期盼等社会共识。政权的分立，并未割断人们心中共同的文化信念，影响“大一统”的传统认知。天下“分”中见“合”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演进，愈益清晰。这为研究五代到宋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而墓志正是这些共识集中体现的地方之一。试举几例。

第一，家世书写中的文化认同。五代墓志主要涉及四种类型的家族，即传统士人家族、武将家族、少数民族家族、普通民家，四种家族成员墓志在家世书写上，近乎一致，大都追溯至汉唐名门，甚至商周旧族、炎黄子孙，其间存在很多托名冒充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北朝墓志类似，但又有许多不同。北朝多是少数民族属托名中原旧族，而五代汉族托名的更多，尤其是下层起家者。另外，部分僧道塔铭在追摹俗姓家族时也存在类似现象。这些均揭示出政权分立形势下，社会阶层剧烈变动，但各族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仍高度一致。

第二，男性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无论是哪种家族成员的墓志，其在事实层面展现的往往是立功、立言的具体事迹，但撰者为志主努力塑造的却是一种“立德”的形象。五代墓志中捐文习武者，所在多有，从文而显者亦较多，还有默默无闻持家有道者。在他们的墓志中，对武的推崇不假，对文的向往亦真。忠、孝、恭、俭、温、良等传统道德观念在墓志中依旧被尊崇。文武兼修是个人追求、子孙教育的理想状态，在乱世之中，这更体现出人们对“文”的渴求。天下大治是所有人的期盼。

第三，丧葬心理上的遵仿旧例。五代墓志中，许多志主并非亡于故土，而是在他乡离去。卜葬故土的“礼也”，权厝他乡的无奈，迁葬原籍的告慰，在墓志中屡屡呈现。由于政权割据造成的“葬非其所”，成为志主后人或志墓者的莫大遗憾。大量亡于战乱甚而尸骨不存的人，其墓志中对葬不得礼的叹息更是异常明显。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夫妻合祔的传统模式，在现实中虽多不得实现，在墓志中却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

通过对五代墓志书写的深入剖析，能揭示出以下事实：在五代十国混乱的表象下，社会共同的思想文化信念并未受到根本动摇，分裂的政权，无法分裂人们心中的“天下”。统一的基础，在分裂中慢慢形

成。这为五代十国及唐宋演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3.3. 建设智能数据平台

目前,五代十国墓志数据库虽已存在,但数据库之间你有我无的情况还较为显著。以中华书局籍合网旗下“唐五代墓志专目”和“唐代墓志铭”两个数据库为例,墓志原文已整合到后者,但其详细介绍仍在前者库中,分属两库的资源并未统一整合,墓志原文也并未完全归并,为避免遗漏,仍需分别在两个库中检索。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知识产权问题。因此,如何在更高层面进行规划,做成统一数据库,仍是今后亟需努力的方向。

此外,数据库的功能基本停留在检索、供图、文字转写层面。就“唐五代墓志专目”而言,除提供墓志基本信息外,还关联研究成果与人物关系,为深入探讨提供了便利。但其研究成果多为著录类图书,研究论著较少,人物关系也多限于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对远亲或非亲属中的重要人物未予关联。这些不足延缓了深入研究的步伐,未来均需进一步完善。

展望未来,建设新一代智能数字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应尽快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提取墓志信息,推动相关数字人文研究。例如,借助人工智能,墓主的家族谱系将变得清晰可见,关系网络一目了然,人生轨迹得以详尽勾勒,墓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能梳理清楚,这无疑对推动人物研究、家族研究、社会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再如,借助人工智能,全面提取墓志中的职官信息与地理信息,结合墓志所载年代及已知的五代相关制度,制作详细的职官体系图、地理沿革表基本可以实现,这对五代制度史研究应有重要推进。当然,类似平台背后的工作是艰巨的。以地理信息中的籍贯为例,有的志主籍贯用的是前代旧称而非现名,有的志主活动在前代但葬于当代,后人为了显示对当朝的认同而改用现名等等,这些都与历史实际不符。因此,在进行数据库建设时,不能仅提取表面信息,必需关联实际地名。唯其如此,人工智能在分析地理沿革时才能符合实际,而这些辨析工作需要学者主导完成。对五代十国墓志而言,因其数量有限,目前尚不足 500 方,故在墓志考释的坚实基础上,建设智慧平台具有相当可行性。

然而,人工智能与学术研究本属两个轨道,智能技术的背后有经济效益的考量,非学者所能左右。因此,数智时代,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愈发重要,学人不能沦为技术与资本的工具。作为具有鲜明考据特征和个性化的历史研究而言,基础性的考辨工作仍是立身之本,至少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撼动,故而在今天尤需重视。

随着学术界对五代十国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墓志作为特殊且集中的原始文献,信息量巨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对其进行深度的开发利用是所必然。而数智时代,则为这项工作增添了助力与新机遇。故略赘数言,祈望来贤取得新成绩。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五代墓志疏证研究”(编号:24YBL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高桥继男,竹内洋介.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墓志综合目录(增订稿)[J].东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2017(52):24-69.
- [2] 谭凯.唐末至宋初墓志目录[M].自印本,2005.
- [3]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M].合肥:黄山书社,2012.
- [4] 章红梅.五代石刻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 [5] 仇鹿鸣,夏婧.五代十国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 [6] 杜文玉. 全五代十国文[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23.
- [7] 杜建录, 邓文韬, 王富春. 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J]. 宁夏社会科学, 2015(2): 129-135.
- [8] 钱汝平. 唐末五代危全讽、危仔昌兄弟家世补证——新见《宋故危先生墓志铭》考释[J]. 文津学志, 2019(0): 279-284.
- [9] 程浩. 广州出土五代南汉李纾墓志初考[J]. 黄河·黄土·黄种人, 2021(10): 29-34+2.
- [10] 刘缙, 史林鹰. 五代北宋时期苏逢吉家族墓志再考[J]. 唐史论丛, 2022(1): 277-286.
- [11] 陈桂苹, 刘广丰. 新出五代《张进墓志铭》疏证[M]//李华瑞, 邹锦良, 陈云斐. 宋史研究论文集(202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342-357.
- [12] 赵耀文. 碑铭与史传: 五代武将西方邳的生前事与身后名[J]. 宋史研究论丛, 2024(2): 136-166.
- [13] 黑维强, 罗易潼, 黑文婷. 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绥州任从真墓志》的研究价值[J]. 敦煌学辑刊, 2025(3): 109-122.
- [14] 崔世平. 新出后晋张奉林墓志与后唐政治[J]. 苏州文博论丛, 2014(0): 37-41.
- [15] 山根直生. 五代洛陽の張全義-『沙陀系王朝』論への応答として- [J]. 集刊東洋学, 2016(114): 48-66.
- [16] 胡耀飞. 五代的“通判”与“判”——从福州出土《赵偁墓志》谈起[J]. 唐史论丛, 2017(2): 288-305.
- [17] 胡倩. 五代墓志文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厦门: 厦门大学, 2018.
- [18] 仇鹿鸣. “伪梁”与“后唐”: 五代的正统之争[J]. 历史研究, 2021(5): 11-32+219-220.
- [19] 山口智哉, 李宗翰, 刘祥光, 等. 五代武人之文[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20] 山口智哉, 李宗翰, 刘祥光, 等. 世变下的五代女性[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21] 山口智哉, 李宗翰, 刘祥光, 等. 五代的文武僧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2] 刘顺, 仲昭龙. 五代墓志文的帝王形象塑造与君臣互动书写[J]. 长江学术, 2026(3): 49-63.
- [23] 欧昌俊, 李海霞.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4.
- [24] 李海燕. 隋唐五代石刻文字[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 [25] 周阿根. 五代墓志词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26] 黄青青.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释文斟补举隅[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6, 41(1): 39-44.
- [27] 张崇吉. 谢彦璋墓志[M]//仇鹿鸣, 夏婧.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46-47.
- [28] 李昉. 太平广记: 卷 35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803.
- [29] 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 16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22.
- [30]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 270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8838.